



邬逸民:借教师工作掩护党组织



邬逸民。

邬逸民(1901年-1956年),又名邬延、邬济民,浙江省宁海县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五四运动时期,与柔石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宁海旅杭同学会并担任校内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从事爱国宣传活动。1923年,杭州一师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到北京,经原师范教师马叙伦介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经常去北大作旁听生听课。不久,结识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姚芳仁,并由该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大党支部的活动。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邬逸民回浙江,担任杭州市民山区区委书记。不久,又到宁海县组建中共宁海县委并任书记,公开职务是宁海中学训育主任。后因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被国民党通缉,遂潜伏于亭旁,参加了亭旁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暴动失败后,再遭追捕,又转辗到福建、上海等地,利用

杭州一师同学潘漠华、冯雪峰、柔石、王育和等人的关系,先后到上海书店、上海罗店小学工作。1929年2月,到上海友华私立泉漳中学任教,并建立中共泉漳中学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后因泉漳中学党的活动频繁,被国民党军警察觉,邬逸民和一批进步教师遂遭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邬逸民到河南开封中学任教。期间,介绍同校教师潘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开封铁路工人集会活动,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特务盯梢告密,突遭围捕。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再次脱身到郑州。1930年6月,受中共河南省委的派遣,赴长葛、尉氏两县巡视党的工作。当时,正值蒋、冯中原大战,郑州户籍稽查甚严,组织上同意邬、潘两人离开河南去北平。期间,发展刘梅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多次参加前门等地的群众示威游行。

1930年10月初,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北平来到宁夏省城。何高民通过国民党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亲戚关系,被安排在省财政厅做职员,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范附属小学任教。不久,邬逸民、刘梅村与杜润滋取得联系。杜润滋、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5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滋为党的负责人。

1930年秋,学校发放奖学金,偏袒一部分学生,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不满,双方矛盾激化,引起学潮。杜润滋、邬逸民在学校发动了一场争夺校方领导权的斗争。最后在师生的不屈斗争下,学潮斗争取得胜利。宁中学潮后,引起宁夏当局对杜立章、杜润滋等人的怀疑,派人暗中监视。1930年冬,宁夏省党部以“共党嫌疑”罪名先后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入狱。1931年初,宁夏省党部将邬逸民、马汉文、赵子元、刘梅村、黄执中等教师解聘,并限期离开宁夏。邬逸民在刘梅村、何高民的帮助下去兰州,由杜润滋介绍在杜斌丞处任机要秘书。当时,在兰州主政者是杨虎城部孙蔚如军长,为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

1931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秘书长常黎夫到兰州,与邬逸民等人取得联系,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并在部队发展党员,策动

兵变。同月,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在兰州成立,统一领导三省工作,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部长,邬逸民为秘书长。同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邬逸民等81人在酒泉参加马仲英的36师,1933年随马仲英部队进入新疆。1934年6月,马仲英被新疆督军盛世才部队击溃,邬逸民失散后潜入迪化一中及新疆学院任教。期间,仍进行革命活动,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宣传部长。

1937年11月,盛世才在新疆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邬逸民以“阴谋暴动”罪遭逮捕,其妻充军伊犁,其弟邬兆民被敌人活埋。1945年初,国民党人张治中进新疆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托请到新疆后,释放在押政治犯。当时,共释放180余人,邬逸民也在其中。出狱后,邬逸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应对恶劣多变的斗争环境,在迪化一中,邬逸民同出狱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1947年,其妻被释放回迪化,邬逸民辞去教师职务,携妻回到家乡宁海县。

邬逸民回到家乡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为党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中共宁北党组织推选邬逸民以观澜中心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使观澜小学成为宁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1948年,党组织又利用乡民代表选举的机会,动员群众推选邬逸民为紫文乡乡长兼自卫大队长,并派中共党员邬光训配合工作,使紫文乡的政权和武装为共产党所领导。1949年5月,中共党员周瑞发被捕,党组织通知邬逸民前往交涉营救。邬逸民不畏风险,多方活动,使周瑞发很快获释。6月,又配合中共党组织营救被国民党长江部队捕获的中共党员邬光训。当时,邬逸民在宁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宁北地区的重大活动,皆请邬逸民参加。

1949年7月,宁海县解放,党和人民曾给予邬逸民很高评价和信任,但由于中共宁北支部在解放初被错误地打成“假党组织”,邬逸民受株连,调三门县中学任职。1956年肃反斗争时,含冤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宁北支部”案得到平反,邬逸民亦得昭雪,恢复了政治名誉。

(据银川党史网)

追寻红军战士祁延福的足迹

祁国平

堂伯祁延福与我同属一个家族,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和积极抗日的故事,脑海中有朦朦胧胧的印象。堂伯祁延福兄弟姐妹六个,兄弟四个取名“福贵清华”,即祁延福(“延”字是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在延安参加学习时由党组织所改)、祁彦贵、祁彦清、祁彦华。据老人讲,堂伯祁延福1936年12月在甘肃省镇原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杳无音讯,直到1952年12月才回到家乡。

1990年9月,我离开家乡先后在银川上学、工作、生活,很少在清明节回去扫墓。2009年清明,我与亲戚从银川回老家为祁延福扫墓,阅读碑文后才了解堂伯祁延福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自此以后,我经常查阅相关资料,追寻他的足迹。

“红色种子”播撒心田 毅然投身革命工作

祁延福,宁夏彭阳县城阳乡杨坪村人,1920年10月24日出生于冯庄乡石沟村,1928年迁回杨坪村油坊组定居,祖辈以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未能上学。1935年10月8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彭阳县城阳乡长城原,夜宿乔生魁家,播下了“红色种子”。10月9日,红军离开乔家渠向东北方向的孟原、三岔行军。乔家渠离油坊组仅7公里,红军夜宿乔家渠的故事就此传播。祁延福耳濡目染,就想参加革命工作,因其年龄太小,遭到父母反对。1936年6月,因红军解放了镇原县三岔,彭阳东北部纳入陕甘宁苏区,红十五军团在三岔马渠活动。10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派出中共固原工作委员会,接管三岔,以三岔为根据地,开辟新区工作。祁延福经常行走在三岔、王洼、红河、麻子沟圈、杨坪一带,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为红军提供情报。1936年11月,祁延福赶去麻子沟圈买盐的机会,到镇原县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独二团。1937年2月,由西征红军改建的追击军。27日,中革军委命令组建援西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命令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为援西军部队。随后,开赴陕西三原、泾阳整训。抗日战争爆发后,堂伯属八路军一二九师。9月,东渡黄河,进入晋南太岳山脉,奔赴抗日前线。此时,原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任一二〇师副师长,祁延福未随一二九师到冀南,而是跟着原独二团由萧克带往晋北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在晋西北一带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被调到平西,同邓华支队合并,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堂伯祁延福在十二支队三十四大队。同年6月,该纵队挺进冀东。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挺进纵队配合下,连克昌平、延庆、兴隆县城,又攻占蓟县、平谷、遵化等县城,堂伯祁延福先后参加了上述战斗。10月,祁延福所在的第三十四大队

从兴隆北撤到隆化县九神庙地区遭日军堵截,在战斗中英勇负伤,1939年初伤愈归队。同年2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晋热察挺进军,祁延福在九团当战士,由萧克司令员率领在平西、冀东、平北一带与日军游击作战。1943年,晋热察挺进军归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司令员率领统一指挥,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1945年3月,祁延福所在的冀察冀军区行进到滦水县后,因其伤残不能随军作战,于15日退伍安置于河北滦水县六区南款村(现其中口乡南款村),享受革命伤残军人待遇,参加当地生产建设。1952年11月回到家乡,1958年冬病故,终年39岁。

一千里路却走了70年

据老人说,祁延福被安置在南款村后,村里给他分了土地,后拜石老国夫妇为义父母,对他特别照顾。由于祁延福不识字,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给家里和宁夏固原县(现原州区)民政局写信,于1952年回到他的出生地。祁延福返回家乡后,一直惦念河北滦水县南款村石姓一家人的情谊,总想回去看看。

祁延福一生未婚,堂二伯祁彦贵三子祁文章为其养子。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党中央十分关心抗战老兵的生活,在彭阳县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下,时任彭阳县政协主席杨忠考证其生平,彭阳县副县长杨正武撰文,县民政局、水利局,城阳乡党委和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为祁延福树碑立传,修缮陵园,并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祁文章及其侄子祁义章、祁连章等一直想去河北拜访石姓一家人,无奈当时经济条件落后,信息不畅,未能前去拜访。改革开放后,祁文章等家人生活逐渐改观,一直寻找石姓一家人却未果。

2021年4月,受祁义章、祁连章、祁文章等家人委托,我按照堂伯革命军人残废证上的信息,给河北滦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写了一封信,寻找石姓一家人,很快就收到了石姓一家的来电,我们家族人十分高兴,决定在建党百年之际拜访石姓一家人。

2021年7月15日,堂哥祁义章、祁连章及堂弟祁久章一行驾车从银川出发,我从辽宁省辽阳市坐火车出发,前往滦水县拜访石姓一家人,追寻祁延福的足迹。在河北廊坊火车站,前来接我们的是从北京赶来的祁瑞雪夫妇。石瑞雪说(石玉川三子),滦水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接到我的信件后,立即转给滦水县其中口乡政府,并把我的信件转到南款村,村支书经过走访,联系到他,他立即给我打电话。一路上,石瑞雪夫妇给我讲解滦水县的风貌。进入滦水县,天气正好下着小雨,远处峰峦叠嶂,十分迷人。经过3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

到达南款村。

“记的,记的,甘肃祁延福,是我的干哥”。90岁的石玉堂激动地说。我们一行给石玉堂夫妇赠送了一幅写有“恩重如山 情深似海”的锦旗、一本《宁夏姓氏族谱》(载有祁延福事迹)、一幅《陋室铭》书法作品,并送上了慰问金。

石老国夫妇育有两子一女,长子石玉川(已故),次子石玉堂,一女石玉梅。“祁延福一别70年,没想到你们还记得我们。”石玉堂说,祁延福来到他家时,他才13岁,一直跟着祁延福在家种地、挑水等,听祁延福讲抗日时的故事,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当时政府给石老国家里还安置了两位红军战士,一位是山西人,一位记不清是哪里人了,这两位红军战士在解放后返回了原籍,再无任何联系。1946年,石玉堂的父亲石老国去世,家里由母亲王平(已故)和大哥石玉川照顾。石玉堂的母亲王平视祁延福为亲生儿子一样,十分关照。石玉堂说,他的哥哥和妹妹一直把祁延福叫大哥。

我们一行参观了石老国夫妇、祁延福故居,瞻仰了石老国夫妇、石玉川遗像。因堂伯祁延福唯有残疾证上的照片且十分模糊,石玉堂忆起家里有祁延福的照片,说他想祁延福的时候还经常拿出来看看,后来因为搬迁,照片放在哪里记不清了。在石玉堂夫妇故居,我们希望能找到祁延福的照片,可惜翻遍所有镜框,最终未能找到(2005年,家人根据祁延福退伍证上模糊的照片,进行了模拟画像)。

我一直想追寻堂伯祁延福在滦水县一带参加抗日的细节。石玉堂说,他小的时候,经常有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滦水县南款村,属于太行山东麓北端,山大沟深,全是石头山,老百姓居住在山底下,顺着河沟开采几分土地,种玉米等,条件十分艰苦。后来,当地政府给祁延福分了几分土地,盖了简易的房子,在那里参加生产建设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祁延福一心想回老家看望亲人。石玉堂母亲挽留祁延福在这里成家立业,无奈祁延福思乡之情浓厚、念亲之恩殷切,最终选择了返回故里。石玉川原是一名教师,后调到滦水县民政局工作,帮助祁延福联系到家乡。石玉堂说,告别当天,他母亲一直送祁延福走了30多公里。

堂伯祁延福的一生,是对党忠诚、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一生,我们永远怀念他!

注:参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下册)《八路军》《八路军抗战纪实》《华北烽火》(上下册)《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纪实》《八路军一一九师征战纪实》《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纪实》

(作者系宁夏彭阳人,现供职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边区群众报》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一份重要报纸,起初由大众读物社主办,后为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1年5月13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在近8年办报过程中,《边区群众报》坚持服务群众、贴近群众,在教育人民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各项建设,保卫边区,支援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



《边区群众报》的特点是突出了党报的群众性,即不识字的能听懂,识字不多的能看懂,因此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

为了群众办报

1939年底,毛泽东与刚从重庆来到延安的“左联”著名作家周文谈话,鼓励他针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编辑出版一张适合边区群众需要的大众化报纸。周文接受了创办大众化报纸的任务,并在边区党委和中央宣传部的协助下,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1940年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正式成立,周文任社长,下设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3月25日,《边区群众报》在延安正式出刊。《边区群众报》的报名为毛泽东建议定名,也为他亲笔题写。

《边区群众报》瞄准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以宣传内容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为目标,致力于创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在版面设计上,采用“大标题+大字号+短文章”的排版设计,开设“科学常识”“农民的经验”“群众来信”“工农写作”“百宝箱”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栏目,让群众更加快速地获取实用信息。在报道内容上,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地域特点,紧密围绕边区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把农业生产情况、生活常识、农业型经济、医疗卫生等题材作为重要内容。在语言表达上,注重行文口语化,较多使用边区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蓝格幽幽”“红格艳艳”“解下解不下”“赶黑”“刁空”等富有陕北乡土气息的词汇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使读者倍感亲切,无形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表达形式上,借用民歌、说书、顺口溜、谜语、图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传递内容,做到既简短活泼有趣又易懂易懂易听,彰显“群众报”的风格特色,受到了广大边区群众的欢迎。

依靠群众办报

《边区群众报》在办报过程中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力量,在人民群众支持帮助下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办报”道路。

指导基层干部和群众完成工作、生产任务。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边区群众报》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宣传,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等,都是经过改编后用农村群众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刊发出来,能够更好地起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以群众为报道主体。《边区群众报》坚持从身边人、身边故事入手,把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奋斗的场景以及一些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作为报道的重点。比如,以模范党员刘玉厚、劳动英雄申长林为代表的劳模群体成为《边区群众报》新闻报道的主角。同时非常关注农村妇女问题,刊登了大量妇女人物的报道,郭凤英、折碧莲、张在英等一批勤劳勇敢的劳动妇女出现在大众视野,呈现了陕甘宁边区劳动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挣脱封建旧束缚、政治地位和家庭地位逐渐提高的生动图景。

聚焦群众关心的问题。《边区群众报》立足陕甘宁边区实际,秉承“说出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原则,专门开辟“群众的话”专栏,鼓励读者给报纸写稿写信,以期真正反映出边区人民的意见与呼声。《边区群众报》从读者来信中选择刊发了很多边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还请专门人员解答,或发动读者讨论,确保每一封来信来稿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为读者和编者直接交流提供了渠道。同时也很重视给读者写回信,这样不仅增进了报纸与读者间的感情,也让报纸能随时了解读者的所需所求。

邀请群众参与办报。为了做到每一篇稿子“念着顺口,听着顺耳”,报社编辑记者常常带上编写的稿子,请社外人员进行“审稿”。即每期稿子编好以后,除了召集报社全体人员一起来参与审查修改,还会邀请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师傅”(炊事员)“小鬼”(勤务员)参与其中。审稿的大致程序是:先读完稿子,再征求大家对稿子内容的看法,如果有什么大的意见和问题,再重新写;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建议,就逐个读一遍。每读一段,就请大家谈谈对这段话的结构、句法和措辞的看法,尽量使之准确、通俗易懂。

办报效果由群众评判

《边区群众报》一出版就立即受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先是十日刊,很快改为七日刊、五日刊。创刊时是一张石印四开两版的旬刊,后来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而且要求报纸扩大版面,充实内容。因此,《边区群众报》出了10期以后,就改为铅印四开四版的周刊,每期报纸由4000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的发行量高达一万多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份报纸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为表达对这份报纸的喜爱之情,边区民众还为“群众报”编了一首歌:“有个好朋友,没脚会走路;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道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

《边区群众报》也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和边区领导人的称赞。1940年10月,毛泽东专门致信给社长周文,指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办得非常成功,报社的工作是意义有成绩的。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之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询问毛泽东最喜欢读什么报,毛泽东直言:是《边区群众报》。1946年4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之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贺信中指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7年10月,《边区群众报》随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绥德县。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改名为《群众日报》。1949年5月,西安解放。报社成员先后进驻西安,并于5月27日出版西安版《群众日报》,成为《陕西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自创办起,在近8年时间里,向边区群众和干部传达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对边区人民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对巩固边区、战胜敌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学习时报》)

《边区群众报》：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